

第十六章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485 日本人得知败北之后，最初的正式反应，可以借用古代希腊或是中国的说法来表达。报纸的社论写的是“一亿相哭之秋”，诗人则吟咏“国土遍起无声的号泣”。心被痛苦的愤怒燃烧，被泪水所侵蚀。战死者之魂最后的憩息之所靖国神社属下的一位将军，则提及“刀折矢尽”这一传统的喻指战败（实际上也指性的无能）的成语，描绘死者的眼泪纷纭落在他的身前身后，死者的面庞压迫着他的背脊。¹

在首批占领军到达前一周，作家大佛次郎在《朝日新闻》上以《英灵に詫びる》（《谢英灵》）为题发表的记事，是写给死者的心里话。述说自己在听到天皇广播之后的无眠之夜，战争中死去的熟人的面庞在眼前浮现：出版社的友人，偶尔一起饮酒的同伴，自己喜爱的餐馆中沉默寡言的大厨，仅在大学棒球赛上见过的男子，擅长写和歌的医生……大佛说他们是拂晓时天空隐去的星辰，想象他们随着地平线上光影的推移而消失，并追问他们在此后的岁月中时刻萦绕许多日本人心头的问题：486 “如何才能告慰你们的亡灵？”当时大佛的答案看起来相当明了：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信赖天皇的决定，“抖落过去的尘垢”，期盼黎明的到来，建立新的日本。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超越屈辱为英灵们“献上安魂曲”。或许只有那时，才能让死者“含笑九泉”。²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当大多数日本人尽力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这一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会从道德和法

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占据了他们的内心。这种想法是真实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胜利者质问谁为天皇军队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在日本人看来，更为紧迫的问题是，谁为战败负责？胜利者关注的是日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首先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痛和内疚所压倒。胜利者可以通过报告战果辉煌，来告慰死者的灵魂并安慰自身。正如胜方的每一位战士都成为了英雄，因而在胜利的战争中最后的牺牲并非徒劳。胜利有助于抚平悲伤。战败则使亲人、友人、广大的同胞战死的意义，变为血肉淋漓的伤口。

终战时的日本人，当然是指大多数日本男人，无人不对帝国军队的劫掠暴行有所了解。数百万人曾赴海外服役，即便自身没有残虐行为，至少也对这些战争罪行有所见闻。而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些残暴行为的人，或者至少不清楚其规模和极恶程度的人，战胜国的宣传机构很快就会提供具体可怕的证据。这一切听上去是如此难以置信，事实证明却更加难以接受。正如大佛次郎在他苦恼的记事中所言，对死去的日本人的无尽行列中的每一个幽灵而言，“都有一位父亲、姊妹和兄弟”。人们可能会诅咒遣返士兵或者蔑视他们，但是对死去的日本人，仍然需要一些哀悼。另一方面，天皇的陆海军士兵杀死的数百万人，仍然是抽象的数字，难以将他们想象成活生生的人。日本人以外的死者仍然面目不清，⁴⁸⁷身份不详。他们当中没有熟悉的形象。³

在胜利者眼中，日本没有什么“英灵”。东京审判清楚地表明，对一个自1928年以来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侵略行为和事实上的“杀人”行为，而且对俘虏与平民的残虐行为如此普遍，几乎可以看作是其国民性的表现的国家而言，使用这样的概念是一种亵渎。日本战败后，可以为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和平民举行追悼仪式，但是不可颂扬他们的牺牲。正如查禁吉田满对大和战舰末日的描写所揭示的，不可能向为国战死者的勇气和光荣高唱挽歌。然而对吉田满、大佛次郎，乃至摆脱了对天皇的最后一丝崇拜的愤怒的年轻复员兵渡边清而言，不把死去的同胞看成是本质善良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数百万的普通人，他们也是通过家人、友人、邻人和死去的熟人来理解自己国家的战败的，同样有着切肤之痛。

当大佛次郎和渡边清这样的人愈加洞察事实真相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战争和日本社会进行更为广泛的批判。战败后社会精英们显而易见的贪污、腐败和无能，本身就足以破坏对权威的敬意，以及对往日的“圣战”神话的信仰。此外，胜利者的宣传和“再教育”，包括东京审判的证言在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先前受到压制的信息，这些信息所显示的日本人在海外有组织的劫掠破坏，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尽管许多人开始承认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涉嫌犯罪行为，但是并未抑制国民在忏悔和赎罪的共同行为中，以肯定的方式安慰己方死者的迫切需求。大佛次郎的随笔指出了对这一困境通常的回应：可以通过抛弃“过去的尘垢”、建设新的社会和文化，赋予死去国民的牺牲以意义。事实证明，这些通往死者灵堂的新的道路，将是迂回而曲折的。

基督徒教育家南原繁在战后不久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他悼念战争中死去的同胞的曲折方式，在许多受尊敬的人物中颇为典型。像许多 488 教育者一样，南原繁为曾经鼓舞学生支持战时“光辉的日本”使命的个人之罪，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南原繁转变为战争批判的先导者与和平的传道者，经历了理论和信仰上大的飞跃。正如常见的情形，这是一次“转向”体验。南原对于新的发现的热情和真诚，早在 1945 年 9 月 1 日《帝国大学新闻》的评论中表露无遗。南原繁开篇谈到，自从这次大战将战争的不人道和惨状以空前的方式呈现出来，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要实现与世界宗教的普遍原理基本一致的根本的“人性的理想”（文章中附有“人性的理想”一词的德语原文 *Humanitätsideal*）。这涉及一场“新的战斗”，战死学生的归魂将参与其中：

我们的“同仁”即将从大陆和南洋诸岛归来。他们重新埋头讲堂、学业精进、燃起再建祖国的理想和热情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然而，想到几多俊秀再也无法回还，我感到无尽的悲哀。他们皆作为军人勇敢地战斗和牺牲。但是在身为军人的同时，直到最终之日他们也没有丢弃学生的矜持。他们无疑坚信，最终兴国者乃真理与正义。今天，他们的灵魂已经归来与我们同在。我将祝福并引导诸君从此投入新的战斗。

南原繁向“英魂们”庄严禀告，大学在战争中奋力保全了宝贵的学术书籍。他确信，英魂闻此将备感欣慰。⁴

11月，在欢迎复员学生的集会上，南原繁率直地告诉学生们，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理性和真理”，而且这些伟大理想的担负者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这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应当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战败和死去同胞的极大牺牲。从悲剧中将诞生新的国家的生命，尽管不经奋斗是不行的。南原繁引用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话，谈到了一场以自我为对手的新的“和平之战”，在民主的方向上发展并对普遍的自由做出贡献的大挑战。最后南原繁进行了富于戏剧性的总结：他不仅欢迎他面前的学生，而且还有他们死去的“战友”的归来。从此刻起，战争的幸存者将与留存在他们心中的死去的战友一道，投身新的“真理之战”。⁵ 489

1946年3月，由南原繁主持举行了东京大学战殁学生职员慰灵祭。南原繁校长以《告战殁学生书》为题的追悼辞，在《文艺春秋》全文发表。他指出，慰灵祭基本上是以非宗教的“精神的”方式，对战死同胞进行追悼，并唤起对罪恶、忏悔和赎罪的思考。他的确也谈到了天皇所说的忍耐，以及像基督徒那样背负“现实的十字架”。他率直正告战死者之魂，是少数无知无谋的军阀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日本引向战争。包括来自大学者在内的国民，因为相信是为真理和正义而战追随其后。不幸的是，真理和正义是在英美一方。对此，历史与理性自有其俨然的审判。他还指出，这并非是说，战胜者一定是正义的。

他继续指出，战殁者已经无需目睹战败之日，以及此后生活的悲惨与精神的痛苦。然而，他们应当知晓，日本人现在感到的愤恨，不是针对战时的敌手而是自身。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的变革正在发生，建设“真理与正义”的日本真正成为可能。南原繁哀悼亡故的众多学生才俊，称他们是“为国民的罪恶而赎罪的牺牲”。⁶

在战败初期的发言中，南原繁有许多问题尚未提及。他没有谈到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也完全没有言及其他亚洲民族。对他现在谴责的东京帝国大学积极参与推进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也未加详述。此外，他对学生“才俊”的称颂，有精英主义的危险和浪漫化之嫌，似乎表明，可以而且应当对战争的牺牲者进行社会价值的测算。尽管有这些局限，南原繁仍然提示了如下的方法：当谴责非正义战争之

时，仍然可以给予战死者以敬意，并告慰（或者，至少使活着的人感到安心）他们没有白白送死。这是胜利者无需面对的道德与心理上的巨大困境，而对此他们少有耐心和宽容。无论如何，南原繁的悼念方式，成为许多日本人非宗教的“祈祷文”。只有那些献身于建设和平与正义的
490 新日本的人，才能够忏悔和赎罪，而追求这些理想就是荣耀死者，因为它们是死者确信曾为之战斗的理想。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南原繁的转向基于这样的确信，即他像他所追悼的寻求真理的学生们一样，被日本的领导者欺骗和误导。在这一点上，南原的感情与国民普遍的感情完全同调。战败后，最常见的受动态的动词就是“受骗”。甚至连最恶名昭著的战时宣传者，也利用这一含糊的说法，洗脱个人的责任。有才能的政治漫画家近藤日出造的经历具有普遍意义。近藤以奔放的热情乘军国主义的战马直达破灭之门，在战后又以同样的热情讽刺铁窗后的东条英机。1946年初近藤写道，在战争开始前生活是安乐的，而无论何时想到这一点，他都感到“对A级战争罪犯的憎恨。我们全体国民被他们利用和欺骗，并且不知真相地在战争中协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于无知和被蒙蔽”。⁷著名作家菊池宽，曾是文学界战争动员的主要人物。通过在题为《话の屑笼》的随想中主张惨败是由压制国民言论自由的有勇无谋的国家领导者所引发的，菊池宽也设法洗脱自身战争协力的污点。⁸

从这一视点看来，不仅是死去的“英灵”，全体国民都是战争的牺牲者。早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对这一命题的详细阐述已经成为媒体的一大卖点。由一帮记者以“秘史”的形式编纂的《旋风二十年：解禁昭和内幕史》急遽出版。这部畅销书的上卷（1926-1936），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上市第一周就售出10万部。据说书店内的新书堆成了小山，热心的购书者则在店门外排起长龙等待书店开门。到战争结束为止的下卷，于1946年3月1日发售，很快售出70万到80万部。同年末，稍加修订的上下卷合订本出版。《旋风二十年》在整个1947年都名列“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以日本人自制的共同阴谋论，向A级战犯审判友好送别。⁹

乡下的途中，听到了天皇 8 月 15 日的广播。他被悲剧性的事态转变所潜藏的商业机会打动，于同一天乘火车返回首都。（风靡一时的《日米会话手帐》，也是在几乎相同的情形下构思出来的。）增永善吉很快从每日新闻社招募了一批记者，这些人大部分隶属于报社的东亚部。他们以报社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再加上自己和同僚们的个人知识，编纂出了所谓的“内幕史”。他们揭秘的方式真实生动，并未受到深思熟虑的束缚。他们并非关注于揭露日本侵略的本质或是对其他民族造成的牺牲（南京大屠杀甚至根本未被提及），也未探讨更广泛的“战争责任”问题。记者们主要基于既存的资料和以前未曾发表的个人素材写出了即席的“揭露”事实，并未促使他们对自己当下所谴责的战时媒体的共谋行为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每日新闻》记者们的念头，只是想指出应为惨淡败北的大“罪行”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¹⁰

他们搜集了通常的犯罪嫌疑人：与某些右翼头子和充当理论指导者的学者沆瀣一气的“军阀”，这些军阀主要与陆军而非海军有关，再加上少数实业家和政治家。¹¹追随当时的流行看法，他们指认东条英机为祸首。前陆军大臣兼首相东条英机因未能在战败后通过自身的举动切实提高威信，从而在所难免地成了替罪羊。9 月 11 日逮捕令发出之后，东条英机向自己的胸部开了四枪。美国记者将他抱扶到椅子上，将手枪塞回他手中，告诉他“东条，拿着它”，并为他拍照。等待救护车时，东条英机将“遗言”交给了记者。随后多亏姓氏不详的美国大兵为东条输血，美国的医护人员才救了东条一命。在被送往急救的军医院的途中，东条被医护人员的亲切和效率所感，不禁向前来看望他的外务省高官褒扬“美国民主之强大”。在经历这一连串不名誉的事件之后，他赠予了美国第八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Robert Eichelberger）将军一把贵重的日本刀。此后，顺利康复的东条，继续在东京审判中宣称自己无罪。

起先人们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并且将会毫不迟疑地自杀。毕竟，492 1941 年时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陆军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发布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东条收到些敦促他“立即自杀”的信函，据说还有人送了他一口棺材。当他终于犹豫不决地鼓起

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外国人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用武士的刀自裁。甚至连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作家高见顺在日记中简洁地表达了这种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另一方面，以如释重负之感迎来战争终结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发现这场轻喜剧很有趣，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地记录，倒霉的东条大将现在“成了混血儿”。¹²无论进行何种阐释，单凭东条英机从一国之首相到一国之首犯加替罪羊的华丽转身，就帮助《旋风二十年》获得了可观的读者。

然而，记者们的共同阴谋论，与其说仰仗对恶魔般的毒辣阴谋家的肖像描写，不如说有赖于对举国领导者的集体痴呆症的诊断记述。这是以粗制滥造的文体，对南原繁所谓普通人被无知的缺乏“理性与真实”的军阀所蒙蔽的说法的添油加醋的描绘。正如《旋风二十年》所言，到1930年代中期，“基于畸形的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日本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地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的极度的非科学性”。如今可以说，整个军队司令部或许都应该关进精神病院。¹³事实表明，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者之船的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很容易导致非常有说服力的关于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领导者们无能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落后。到《旋风二十年》摆进书店之时，这种科学与“战败493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固定的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空投原子弹联系在一起。从8月8日首次报道广岛被“新式武器”摧毁，到9月中旬占领当局禁止言及核破坏期间，在头几天过后，广岛和长崎日益高涨的恐怖气氛在单张的新闻日报中，根本未被提及。在占领军抵达之前，公开发表了最初的详细调查的摘要，称广岛和长崎为“活地狱”。核辐射的致命影响——使看似生还的人突然死去，在短短两周内估计死亡人数竟然翻番——被描述为“恶灵”占据了广岛。¹⁴当地到处弥漫着对可怕的、超现实的新的生存维度的体验感，是其他人所绝不希望了解的。这种核破坏意识，即便不是最显著的因素，也是此后尝

试诚实面对战争意义的必要因素。它强化了普遍渗透的无力感，并为或许无谓的战败赋予了奇异的特殊性。

战败的前一天，后来成为东京战犯审判主要辩护人的清瀬一郎，公然推测美国人对日本而不对德国使用原子弹的缘由，是因为对日本“猿人”的种族蔑视。¹⁵然而，尽管战后普遍谴责美国空投原子弹的“残暴”与“非人道”，深刻的反美仇恨却并未持久延续下来。甚至在审阅制度实施之前，大多数关于核破坏的见解，就已经转向哲学性的基调：主要是武器本身而不是使用它的人，承担了残暴与非人道的特性。从这一点出发，谴责的是战争总体的残酷。战败、牺牲、压倒一切的无力感，面对梦想不到的破坏性武器，很快融合为新的反军事化民族主义的基础。¹⁶

日本通过“原爆”体验而成为非军事化、非核世界的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去的失误（或曰罪行、罪恶、罪孽）的想法，最终将成为和平运动的主要宗旨。但是这种以“忏悔”的语言方式清晰表达的想法，甚至在占领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8月27日，内阁情报局总裁向国民发出指示，如何应对外国的占领。他说，战争是相对的，总是要由败者而非胜者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期望的。“一亿总‘忏悔’”应当彻底进行，或许通过承担禁止未来使用核武器的领导角 494 色，日本人可以从“战争的失败者”转变为“和平的胜利者”。¹⁷

然而，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因此，原子弹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成为未来战争的警钟的同时，也成为照亮日本将来实力恢复之路的烽火。8月15日辞职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于同日傍晚解释说，“这次战争的最大欠缺是科学技术”。退任的文部大臣同日发表声明，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期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从此以往，他们的任务就是提升日本的“科学力与精神力”到最高水准。3天后，报纸新闻登载了新就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关于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8月20日《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直率地断言：“我们败给了敌人的科学，向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篇题为《科学立国》的文章，特意强调了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包括在各级组织和社会的各个层面讲求“理性”和“合理性”。这正是南原繁和其他无数人所要持有和发展的观念。数日后，《朝日新闻》再

度强调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非理性与非科学的态度是如何普遍，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战败。¹⁸

“科学”很快成了几乎人人喜欢的概念，用以解答为何战败以及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的双重疑问。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男爵激励国人拿出勇气，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压抑的理由，以说明为何必须鼓起勇气：因为旧日的敌国拥有优越的物质财富、机械力和工业技术，此外还在应用科学上领先，正如原子弹所见证。东京湾投降仪式两天之后，文部省宣布将设立新的科学教育局。在对青年学生的讲话中，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解释说，“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是“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据公布，改订后的教科书将更重视科学精神的形成。日本政府宣布，从战时国防献金的剩余资金中划拨 5 亿日元，用于促进一般日常生活的科学化。¹⁹ 即将在菲律宾接受审判的山下奉文大将，也毫不掩饰地重申了这一熟悉的主题。据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称，当被问及他所认为的日本败北的根本理由时，山下大将以整个访谈中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回答说，“科学”。²⁰

这种只关注“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做法，本质上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然而，正如能拆开织物的松脱的线头一样，此时这正是拆开日本帝国结构的线索。首要的欺骗国民者不再是“鬼畜米英”，而是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和压抑的体制的不负责任的领导者。从而，上当受骗的意识与“战败的责任”问题，不免使人倾向于更加多元、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社会，即占领军改革者们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当杜鲁门总统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了自由的民众所能达到的成就之时，他发现日本的听众竟然乐于接受。科学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之下才能繁荣发展。²¹

日本的科学家中有许多人学成于欧美，他们拍手欢迎这一新的信念。战败之后首批派遣到日本的美国科学家，实地遭遇了这种情绪的绝妙表达。那是用英语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一份临时通知，就贴在东京近郊一所大的海洋研究所的玄关门上：

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生物研究所。

如果你是从东海岸来，你可能知道 Woods Hole、Mt. Desert 或

者 Tortugas。

如果你是从西海岸来，你可能知道 Pacific Grove 或是 Puget Sound 生物研究所。

这里是像它们一样的场所。

细心照料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坏。

你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

但请为日本的研究者保留民间的设备

当你在这里完成了工作

请通知大学，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

496

这份通知署名为“最后离开的人”。²²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主义之忏悔

8月28日，美国人的第一支先遣部队抵达厚木航空基地，“忏悔”的概念被置于了公众议论的中心。当被日本记者问及“战败的原因”时，东久迩首相仔细地解释说，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包括许多规则的制约，军部和政府当局的错误，以及国民道义素质的低下，比如说显而易见的黑市行为。随后，他借用前一日内阁情报局总裁声明中的说法，断言“军、官、民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我相信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²³

此前两周，军部和文民官僚一直忙于销毁表明其罪行的证据文件。就在那一刻，关于“责任”的均一化、集团化的说法成了某种堕落的真实。没有人想要负责任，也没有人自己要求负责任。数年后，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诙谐地将政府的“总忏悔”，比喻为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²⁴ 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且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但是官方版的“总忏悔”，事实上就像乌贼鱼的墨汁基本上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文民官僚负有同等的战争责任。一位乡下男子激愤地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农民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将要获胜时败北。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忏悔。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

人中的另一位更是单刀直入。他向报社投书：“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者如今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²⁵

497 当政府提倡其总忏悔之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田边元，正在就同一题目完成一部书稿。田边元的著作，是一位严格而孤高得颇具传奇色彩、长期以来以信念坚韧著称的知识分子，对于怀疑、精神危机和思想转变的激烈的个人告白。尽管晦涩难懂的文体反映出田边所受到的德国哲学的专门训练，但他的文字时时流露出对亲鸾有关救济的睿智的一种法悦。亲鸾是一位十三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和佛教布道者，他的预言是对苦难与虚无、绝望与否定、转换与新生的共鸣，似乎与战败的国家氛围神秘相符。

很难想象还有比田边元关于忏悔的缜密论证与政府在同一问题上的陈腐论调更为鲜明的对比了。然而有一点事实除外，即田边元的“忏悔”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对亲鸾教义满怀激情的再考察，强调的不仅是自我批判或者对日本的批判，而是对所有当代国家和文化的批判。田边元接受战败，承认恶行与绝望，请求忏悔，展望新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强调日本独特甚至优越的传统智慧的方式进行的。他主张要照亮日本独有的赎罪之路，展示出比任何西方思想更伟大的超凡智慧。对许多有思想因而深受苦恼的爱国者而言，这是颇为奥妙的悔悟哲学，是从败北中得来的精神胜利法。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遗留的废墟，日本人无可否认地负有巨大责任，赎罪之道乃至拯救全世界的道路，就存在于一位日本先知的预言当中。

田边元的这些思想并非为回应战败而展开。他的“忏悔道”是由他在 1944 年最后数月的经历而来，当时他正准备从京都帝国大学荣誉哲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的最后讲稿。田边元长久以来一直是热情洋溢的民族主义者，他“非政治的”哲学理论，正适于支持军国主义者种族的与国家中心的意识形态。严于律己的田边元意想不到地发现自己跌得粉碎：国家面临破灭与耻辱，而许多学生的战死，使他承认了自身的责任甚至是罪孽的深重。数年后他忏悔说，“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发现自己不能积极抵抗（战时的思想统治），多少受到时势风潮的支配。这使我深感自惭。已经盲目的军国主义仓促地将许多毕业生、在校生驱上战场，牺牲者中有十数名学哲学的学生，令我自责痛悔至极。我只能垂下头认

真悔悟自己的罪过。”²⁶

1945年2月田边元几乎完全隐居。在崩溃巨变的数月间，他奋笔疾书。他的著作《忏悔道としての哲学》（《作为忏悔道的哲学》）于1946年4月出版，正是东京审判开庭之前。²⁷在他注明写于昭和二十年十月的《序》中，田边元描述自己战争结束时的精神状态，颇类于临床心理学或宗教之回心的研究者的描述。他谈到了深刻的不安、苦恼和折磨，谈到悲伤与痛苦、优柔寡断与绝望，以及压倒一切的惭愧与挫折感，谈到陷入知性的危机与“精疲力竭的境地”。在其著作的开篇，田边元沉浸在自我否定的发作之中，认定自己“罪恶深重且性多虚伪”、“浮夸虚荣”、“愚痴颠倒”、“不正直不诚实乃至无耻无慚”。²⁸

日本的自责传统中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当属亲鸾，他是自我憎恶与法悦回心的先达，日本最大众化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的鼻祖。田边元对邪恶的自身的谴责，其实读来有点儿像是对这位先达的剽窃，因为亲鸾也曾同样如此署骂自己。亲鸾还超越自我憎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似乎尽其所能地预言了1944—1945年的危机。这位伟大的中世的传道者，为一时迷失方向的现代哲学者，指明了通过否定与转换超越现世（往相），并实现向现世肯定的回归（还相）的道路，恢复了田边元对自身的信心，并带给他以惊喜。田边元感受到自己的新生，并重获以前的哲学的自信。而现在田边重新审视世界。他写道，忏悔不可能没有痛苦，然而“忏悔的核心是转换的体验。痛苦转为欢喜，惭愧换作感谢，是为其本质。当今我国除忏悔外别无他途……此非单止绝望之意，同时还有转换复活的希望意味”。²⁹

田边论文中的许多佛教隐喻，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在占领下的日本读者看来，无疑具有双重意义。田边谈到“自我抛弃”，谈到力与无力，谈到他力对自力，都是亲鸾的佛教流派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对美国作为他力的思考的回响。他谈到超越错误的教义和“过去的邪恶传统”，古典的亲鸾思想就像是在败北的熔炉中新铸造出来那样闪亮。

考虑到田边先前是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研究者而闻名，他的“忏悔道”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曾在德国与海德格尔及其他学者一同求学，他的声望主要来自于对欧洲思想的认同。据说田边从来不笑，从不随便交谈，从不因琐事走出家门，从不在他优美的故乡京都游

山玩水，从未屈尊出游，哪怕是到临近的大阪。而且，除了他的民族主义和一些先在的佛教思想，他从未背叛过他的欧洲哲学之神。现在，在自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屈辱的时刻，田边以新发现的忏悔理论宣布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劣势。

在此重大问题上，田边戏剧性地乖离了将忏悔等同于接纳西方思想的“理性与真实”的南原繁等知识人。他写道，正如亲鸾为他指明了穿越个人危机的道路，这位伟大的导师也可以为日本指明走出疑惑与泪水之低谷的道路。因为亲鸾的睿智超越了康德、黑格尔或是海德格尔的智慧，事实上超越了西方哲学或宗教的任何提示。亲鸾的教义著述，提供了“从西洋哲学的诸体系不易求得的积极原理”。它们使“以西洋哲学为指导无法得出的社会性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亲鸾指明了“对康德理性批判的最终归结”之路。³⁰

当其他许多人颂扬“科学”与“理性”是国家赎罪的关键所在时，田边元认为西方理性陷入了二律背反、无法调和的矛盾困境，是走进了死胡同。正如一朵花历经了七开七落，然而最后的凋落或曰否定，可能是迈向亲鸾式的往生的最后之死，从而进入超越西方论理僵局的世界。田边着重阐释亲鸾的教义不仅提示法悦的否定与超越的转换体验（往相），还强调“向现世的回归”（还相），将其视为发生转换的个人有能力向他人指示睿智与慈悲之道的体现。正如向亲鸾的净土真宗皈依而重获新生的中世的改宗者那样，他们会继续其俗世生活，只是多了一颗觉悟之心；1946年的日本的忏悔者同样经历了精神的觉醒，同样能够以新的活力与洞见致力于社会、政治之紧要任务。田边极力期待“在当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之际”，他个人的体验与理论能够“从超越双方的立场指出具体的中间道路”。³¹

田边元以独立的知性宣言，肯定了日本具有这样一种传统：不仅能够为日本战时的愚行赎罪，而且孕育着救赎世界的潜力。正是通过战败与忏悔的体验，日本或许能够向已经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胜国，展示通向健全世界的适宜的中间道路。田边时常行文压抑，但却无所顾忌。他对胜利者的批判异常直率。他主张“民主与自由主义，无疑正在制造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同时，社会主义将平等作为目标，但是社会主义体制限制自由，并在此意义上否定自由却是不争的

事实”。亲鸾的“还相”说，提供了阐释新的社会理想的基础：“民众以综合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兄弟性（友爱）相互结合”。向世界展示“使我们能够克服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对立原理的具体原理”，完全是“命运授予我国的历史使命”。³²

这是为新的意识形态目的对古老的宗教教义大胆创新的利用。田边元以亲鸾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为出发点，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的创造，这一主题在田边其他的著作中亦曾展开论述。同样，他将佛教对利己的批判，作为攻击发达资本主义的“个人享乐主义”的立足点，并将亲鸾“超个人的”对他人之宥和，与败北之际超越一切的大目标“绝对和平”相融合。³³ 田边向许多读者提供了从内部批判自己国家的道路。“忏悔道”逃脱了“西方”思想的霸权，并把批判之光投向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甚至对征服者坚信要强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根本性改革，田边也深表怀疑，设法在其论述中掺进蔑视性的评论，他评述说，“他者强制的自由主义既无意义又自相矛盾”。³⁴ 此外，尽管田边元先前对皇权深表敬意，他的新的忏悔道立场，却使他与政府倡导国民对天皇的战败的罪恶感、进行“一亿总忏悔”的运动完全对立。依照田边的见解，天皇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应当表示忏悔，并在其他国家和自己的国民面前切实承担起战争责任。这种对天皇的立场，与占领当局的立场相比，与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观念僵化的战胜国所承认的日本人可能达到的批判立场相比，远远更具有批判性。田边甚至敦促将皇室保有的莫大财产划拨国家，分发给穷人。³⁵

田边在日本当代被认为是战后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而且其魅力之源清晰可辨。他告白式的文风格调高尚，他宣扬忏悔与新生，并复活了日本历史上的文化英雄。当战胜国谴责日本是失败的文化和侵略的祸首国家时，田边承认日本的恶行与罪，但是否认这些罪恶为日本所独有，并且驳斥本国的传统文化毫无可采之处的观点。他写道，“我们被误导的民族主义，的确有必要进行忏悔道的清算，但是与此同时，被民族主义所沾染的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当然需要忏悔。”他于1946年出版的力作，在结尾处昂然得出同样的结论：“显然我国不是唯一有必要忏悔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应当对自己的矛盾过失罪恶，进行正直而谦虚之忏悔。忏悔是世界历史中今日诸国国民之任务。”³⁶

南原繁与田边元等著名知识人所提示的对忏悔和赎罪的思考方式，其遗产得到了持久的继承。1947年末到1950年间，当时东京审判临近终结，审阅制度渐趋缓和，反对冷战期军事化的国内和平运动汇集壮大，受到南原繁赞美、田边元哀悼的战殁学生，通过他们战时动人的书简而复生。1947年12月，东京帝国大学战殁学生的手记集《はるかなる山河に》（《在远方的山河》）出版，引起了争议。两年后，《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听，海神之声》）发表，收录了东京大学及其他大学75名战殁学生的战时书信、诗与日记。这部畅销文集的编者承认，他们小心排除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更优先入选质疑者和梦想家的真情告白。⁵⁰² 文集的衬页上，印制了一位在太平洋岛屿饿死的学生兵的日记本上的素描，饱含感情的卷首《感想》与卷末《解说》，则提出了对这些文章有可能被利用“再次招来战争者”的危惧。

时代的悲观气氛在这本文集中有浓重的体现，与战败之后南原繁祭奠战殁学生呼唤光明和平未来的梦想形成鲜明对比。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在卷首简短的《感想》中，请读者们想象一片遍布浸透着鲜血的白木十字架的原野，并且宣告“再也不要竖立这样的十字架。一个也不”。同校的小田切秀雄所作卷末的《解说》，描绘了一幅荒凉的景象：真的民主革命已经被挫败，战争的臭气重新在空中弥漫。小田切解释说，正如《听，海神之声》收录的沉痛手记所预示的那样，对人性与理性的追求，必须靠不惜一切代价地守卫和平来保障。他总结说，“流洒的鲜血，除了保证这些鲜血绝不再流之外，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如今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文集的编者在提到“再次招来战争者”之时，心里想到的主要是美国人。本质上，纯真高贵的死者是被重新召唤起来，以对抗美国人的。³⁷

东京审判终结前后出版的其他著作，同样巩固着这种对战争意义的重新构筑。其中最有名的是竹山道雄的《ビルマの竖琴》（《缅甸的竖琴》），一部博得极大人气的小说。（与《听，海神之声》一样，它很快被拍成了电影。）竹山道雄试图以小说完成田边元在哲学上的冒险之旅：通过佛教传达出战争的意味——苦恼、内疚，尤其是赎罪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复员兵水岛安彦，成了想象中的对本国战殁者莫大的灵魂安慰。水岛目睹了战争末期绝望的悲惨战斗，从而拒绝回归日本并成了一

名僧侣，决意在密林中搜寻并埋葬饿死以及在战斗中被杀的战友的遗骨。水岛拥有一副美妙歌喉，他的歌声时常给战友们带来欢乐。优雅的他随身携带着一把乐器，即小说题目中所提到的竖琴。在这里，一个日本兵以别样的面目出现，近乎圣人。在小说结尾的一封信中，水岛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想学习佛教的教义，思考并汲取它们。的确，我们，我们的 503 同胞，饱受痛苦。许多无辜的人成了无意义的牺牲者。那些像年轻的树木一样的人，纯净而贞洁，³⁸ 离开家乡、辞别职场、步出学校，最终将尸骨抛洒在异国的土地。我一想到这些，就感到无比痛恨。

水岛被为什么世上有如此多的痛苦和悲伤的问题所折磨，而这正是佛教的核心问题。水岛总结说，对此，人也许永远不能完全知晓。尽管如此，日本近来的痛苦是由自身所招致：

我们国家发动了战争，被打败，现在又经受痛苦。这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脱离了控制。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而且忘记了做人的根本。因为我们的文明在某些方面异常浅陋。

水岛说，这些不仅是日本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对他自身而言，他打算用一生来研究思考这些问题，帮助别人，像拯救者那样努力践行。

尽管《缅甸的竖琴》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它几乎立即被收入了流行的儿童读物（在较为难懂的文字旁边，用语音进行标注）文库中。竹山道雄还为少儿读者写了简短的附言，提到了《在远方的山河》，并表示希望他自己的书，能像学生们的书简一样，使某些战死者重生。³⁹《在远方的山河》也在《听，海神之声》初版后再版，并以 1946 年 3 月南原繁的《告战殁学生》作为序文。⁴⁰ 如此一来，各种关于战争与赎罪的著作和讲演交相辉映，成为大众文化较为经典的存在。很快，包括“原爆”幸存者回忆在内的有特色的流派——“牺牲者”文学形成，不仅是以反军国主义与和平的名义，而且以忏悔与赎罪的名义出现。

1950 年，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出现了翻译小说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为是描绘太平洋战争最优秀的美国文学作品。⁵⁰⁴ 梅勒通过对一场残酷的海岛之战的再现，再次确认了战争总体上是无意义与无以言喻的残酷行径，以及美国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暴行的印象。好莱坞电影版的《裸者与死者》在日本上映之后，小说家椎名麟三评论说，梅勒的描绘证实，即便是基督徒，也不能诚实面对战争杀戮带来的罪的问题。⁴¹ 几位优秀的日本文学家，都以个人的军队体验写出了杰出的反战小说。1952 年出版的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对帝国陆军的堕落与残忍的描摹震撼了读者，并作为当时的经典受到广泛赞誉。同年发表的大冈升平的杰作《野火》，描述一名掉队士兵在菲律宾遭遇日本士兵相残而人吃人的场面，最终发了疯。⁴²

对暴行的反应

各种文化和各个时代的人都神化己方的战死者，而很快忘却他们的受害者——假使他们曾经真正想到过那些受害者的话。许多日本人对这种狭隘意识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即使是当他们称颂因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悲惨牺牲的同胞之时。1948 年，自由主义与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组织正式的和平运动，他们承认这种狭隘的牺牲者意识是一大难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牺牲者意识是最终建立更普遍的和平意识的唯一基础。他们主张，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动员反军国主义的情绪的切实之道，就是保持对身边的伤亡与苦难鲜活的记忆。反战意识就像是一组由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的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超越国民意识和种族意识的内向性需要时间。⁴³

实际上，牺牲者意识从未被最终克服，而这些想象的同心圆的外侧圆也从未被描画出明确的轮廓。尽管如此，那么多人采取“无辜的旁观者”的态度，依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有时，这些批评是高度理论化的，如知识阶层对日本文化中个人责任的“主体”意识的薄弱进行的激烈论争。⁴⁴ 有时，这些批评则单刀直入。1946 年中，保守的教育家津田左右吉承认，国民被法的强压与军部宣传所共同蒙蔽，但他指出了如下事实，即日本在此期间一直存在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津田主张，“国民”自身负有责任，“因为知性脆弱被欺骗，而且没有勇气反对

和抵抗压迫”。⁴⁵ 评论家阿部真之助对东京审判终结的反应，同样是“大多数的日本人”被军部的指导者所欺骗，“必须为自身如此愚蠢而担负起责任”。⁴⁶

多数左翼人士回避“民众”的责任问题。他们当中的教条主义者，热心于将民众描绘成被国家及其统治者榨取的牺牲者。一些进步人士还主张，过分追究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容易与政府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亿总忏悔”以及战时领导者极力倡导的日本单一民族论相混同。⁴⁷ 然而，不少国民在此问题上吐露过心声。长野县的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当地青年团体的月报上评论说，“败战后，报纸一致声讨军部的罪行。……政府欺骗我们自然是恶行，但是我们被欺骗的国民就没有罪吗？我认为愚蠢也是一种犯罪”。⁴⁸ 东京审判临近结束时，一位农民向报社写信说，这是所有日本人对战争中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反省的机会，而并非只是作为第三方旁观审判。他主张“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对权威太懦弱和盲从，我们也在接受审判”。当7名战犯被执行死刑之时，大阪的一位师范大学的教授同样敦促同胞要认识到，这绝不意味着战争责任的问题已经打上休止符。他指出“领导者自身不可能打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国民被操纵并且踊跃追随迈入错误的侵略战争，由此招致悲惨的战败。有罪的并非只是指导者本身，全体国民都必须承担责任”。他接着说，今后，国民必须自我裁判，永远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为达此目的，他提倡将战犯的死刑行刑日定为国民反省日。⁴⁹

这些普通人的意见，有时还附带着对日本人暴行的认知。当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野蛮行径，如南京大屠杀，被日本的随军记者目击并在国际上公开之时，日本国内却并无揭露报道。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开始 506 时被提出，《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栏目悔罪地表示，“报纸上没有一行真实的报道，真是可耻”。⁵⁰ 1945年初包括马尼拉大屠杀在内的其他集体屠杀行为，也被隐瞒报道。围绕在菲律宾和中国的暴行进行的最初的详实报道，使日本人受到了猛烈冲击。其震撼效果如此强烈，以至于使其他暴行相形见绌。（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的日本兵嗜食人肉的报道。）对白人的常规的战争犯罪，远非如此令人不安。毫无疑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战胜国的白人在被占领下的日本成群出场，才使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变得清晰可见。对日本前殖民地臣

民朝鲜人与台湾人的罪行，无论对战胜国或是战败国而言，其受关注程度都相对薄弱。至于被日本皇军残酷役使导致死亡的数量庞大的印尼“劳工”，则几乎根本未被提及。⁵¹

无论如何，从1945年9月到东京审判终结，日本军队的暴行得到了广泛报道，不少人表示出真心的厌恶。当马尼拉平民大屠杀曝光时，一位士兵的母亲向全国性的报纸寄去一封惊人的信件，声明“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一位年轻女性，在回应事实真相的信中宣言，“当我听到这件事时，第一次明白了‘总忏悔’的意义”，从而为政府只考虑自身的“一亿总忏悔”运动赋予了个人的含义。一些从菲律宾复员回来的士兵，即便当回想起自己的战友在那里地狱般的死亡时，也公开表明了对自己罪行的悔意。⁵²羽仁说子等女性改革家，以马尼拉大屠杀的揭露，来表明这种不同寻常的暴行绝非特殊行为。羽仁说，战争反映出一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文化水平。她自从在北京经营学校起，就见识到了类似的暴行。据她看来，这些对平民的暴行，暴露出日本男性心理中女子地位的低下，以及日本人对他人之子普遍的漠视。⁵³

这些认识将“战争责任”的问题，推向了文化考察的中心地带。左翼杂志《太平》，以《国民的道义低下吗？》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对施加于其他民族的暴行的钝感，来源于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平等人格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道德”的缺失。⁵⁴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将这些行为归因于不平等的、高度阶层化的社会中可以想见的“压抑的转移”。《朝日新闻》的社论作者与专栏作者，将此看作是一种社会病态，不仅反映出民族的傲慢，还有教育与道德的根本缺陷，甚至是日本人宗教信仰核心部分的缺失，导致了欠缺严格道德行为规范。⁵⁵在中西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受压迫的亚洲民族的野蛮行为，暴露出“源自我们心底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排他主义与利己主义”。⁵⁶

其他人对暴行披露的反响，大多没有如此深入的分析。东京审判开始后不久，一份石油会社的杂志刊登投稿，用同音字的双关语，辛辣地将皇军称为“蝗军”。投稿者称，“这次战争的责任，实在于全体之国民。”另一位作者回应南京大屠杀的披露，写道：“过去我们吃的每份食物、我们穿的每件衣服当中，都浸透着一滴中国民众的血。这是我们

国民的罪恶，必须由全体国民负责。”⁵⁸ 不习惯公开发表意见的家庭主妇、农民等普通民众，也寄信给报社，表示向中国人谢罪，并询问日本人如何才能补偿这些恐怖的行径。⁵⁹ 龟井文夫在他 1947 年的影片《战争与和平》的开头数分钟，对中国的悲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是这种罪的意识的电影表现。这种感受不同寻常，但是没有人觉得古怪或者不合适。

一些男女诗人借助传统的诗歌，来表达他们知晓同胞暴行后的心情。东京审判终结后发行的一本诗歌杂志，发表了下面这首激起广泛反响的短歌：

历历在目地
日本军队的暴行
被揭露出来
使人在不意之间
不由得大吃一惊

1947 年初，一份乡村的诗歌杂志发表了如下短歌：

日本兵的罪
在南京和马尼拉
他们犯下了
难以言喻的暴行
一定要进行偿还

诗人佐伯仁三郎，以此为题写了两首诗。一首写的是他知道在中国的暴行后的心情：

如此的悲伤
在今天的日子里
竟然使得我
忘记了今天就是

第二首写的是：

在孩子面前
侵犯他们的母亲
哪管夫与妻
强占已婚的妇人
这就是帝国军队

事实上，日本公众从未看到第一首诗的发表。这首诗被 GHQ 所查禁，因为审阅官显然对任何的日本人感叹败战的公开表达都神经过敏。⁶⁰这可真够倒霉，因为佐伯此诗显然不是悲悼战败，而是忠实有效地传达出当国人的罪行暴露之时，他如何睁开双眼以及他的良心所受到的冲击。佐伯的诗属于为数不多却极其珍贵的声音。在此后的岁月中，随着冷战氛围的加强，占领军将新生的共产党中国视为大敌。阻止日本人的暴行记忆，成了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皇臣下直接造成的惨剧暴露的这些敏锐反应，从一开始就是脆弱而破碎的，从未能发展成对日本是施害者而非受害者的真正广泛的大众认识。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1947 年 12 月，在东京审判判决下达前一年，大众月刊《VAN》痛烈讽刺舆论的世事无常，悲叹说“当年那些战争煽动者即今天所谓的‘战犯’登场之时，我们拍手喝彩欢迎他们，等他们失事之后，我们追着他们唾骂。而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他们遗忘”。此杂志谴责这是“对战犯的怠惰”。其他刊物也有同样的批判。面向知识分子的杂志《世界》的编辑者认为，对东京审判乃至判决的漠不关心，只能看作是“国民的颓废”令人寒心的又一例证。“颓废”一词则是当时流行的文化批判用语。《每日新闻》的视角稍有不同，悲叹随着审判的拖延公众越来越超然，但同时指出，对纽伦堡审判，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漠不关心的反应。⁶¹

当东京审判临近结束时，媒体使用如今已经具有魔力的“和平”与“民主”的语汇对审判的意义进行评价。《每日新闻》警告说，惩罚战争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全体“洗清”了反和平的罪责。面向实业界的《日本经济新闻》呼吁“反省”，并强调国民现在负有确保国家的领导者遵守和平与民主的原则的责任。《朝日新闻》对国民未能积极抵抗独裁统治表示遗憾，并对《朝日新闻》本身曾屈从于军国主义者感到羞耻。现在的任务是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在这种自知之明的基础上决意“建设和平的民主国家”。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的周刊《日经连タイムス》（《日经连时报》）发表社论称，“日本人必须信奉民主主义，切实理解‘反和平罪’的意义，像积极爱好和平的国民那样生活”。⁶²

然而，认为正义得到了真正行使的人却不多。尽管一些评论者真诚欢迎“反和平罪”的法律概念的出现，但是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战时领导者集团并处死其中少数人以创设先例，在当时并不能感动多少人。就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羽仁五郎也回应说，绞刑是种不该滥用的“严重的牺牲”。⁶³

这些反应中深刻的矛盾情绪——期待感与宿命论的奇妙混合——反映在一些小型刊物在东京审判的宣判与死刑处决之际发表的短歌中。一首应景诗，提到了判决带来了如释重负之感，甚至是为创造新的国家重续承诺。例如，静冈的地方月刊《静冈展望》于1949年初刊载了如下的短歌：

自从听到了
七名战犯被判处
死刑的消息
从内心深处涌出
重建日本的力量⁶⁴

然而，更具代表性的是认命与无常的情绪。在日本发行的无数诗歌杂志 510 中，一首女性诗作绝妙地捕捉到了这种感受：

眼下暂接受

严厉的审判
然而内心里
仍然感觉到
小小的踌躇⁶⁵

其他一些诗作提及听闻执行死刑的消息，默默地回到宿地，或是无味地咀嚼着午餐，或是说起妻子纳闷为何判处死刑者中包括前首相与外相广田弘毅在内。⁶⁶

1949年5月，GHQ审阅制度接近终了。一位札幌的居民发表的短歌，使人想到即便是“A级”战犯祸首东条英机，也能唤起同情：

我既赞同也反对
兄长的看法
他小声地说起
东条毕竟是伟大的⁶⁷

公众对东条英机的评价相对上升，可以看作是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晴雨表：这并非是对战争时代的怀旧表示，而是对同盟国的双重标准含蓄的批判。然而，东条英机人气的小幅回升，似乎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极端隐秘且具有反讽意味：在被占领受奴役的世界中，东条是公然反对美国人的最著名的日本人。这是胜者与败者马拉松式的舞蹈中又一种离奇的舞姿。在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尤其是美国人的统治之下，日本的知名人士无人敢对占领政策公然表示异议。在此情形下，最自由的人莫过于在东京审判中主张自己无罪的战犯被告人。他们至少被允许对胜者的立场公开表示异议。在法庭之外，所有其他社会名流只得隐忍不言。基本上，其他人都在溜须拍马。⁶⁸

像他为之尽忠的君主裕仁一样，东条英机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指向标的作用。通过挑选东条英机作为侵略与败北最显著的标志，美国人与日本人共同将美日之间的冲突，设置成了这场亚洲战争的中心维度。尽管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而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是他被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的理由，主要与他参与决策对

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在东京审判期间，GHQ 的审阅官压制了 511 认为东条的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的批判声音。甚至在审判结束之后，这种批判的见解仍属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在文章中提出这一主张，并发表在学术杂志的 1949 年 6 月号上，结果遭到全文查禁。⁶⁹

1948 年末，东条英机等 7 人被执行死刑，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到 1949 年秋，据可靠情报，约 500 名前日本飞行员在 SCAP 的支持下，被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所雇佣，以期协助夺回中国大陆。⁷⁰ 秘密的征募事件被揭露，让人忆起中国正被遗忘的曾遭受的劫掠，日本军人曾经如何恐怖与训练有素，他们受到的反共教导是如何强烈，以及他们在亚洲大陆作战拥有多么丰富的直接经验。美国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Robert Eichelberger）中将在东京审判期间曾公开吐露一句骇人听闻的评语：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⁷¹ 可以想见，东条英机在走上绞架之前留下的遗书，也是强调反共。东条在退出历史舞台时，仍然站在时代的前端。

巢鸭监狱内东条的一些幸运的未被起诉的同伴，在东京审判结束以及中止对他们的战争犯罪指控之后，几乎立即得到机会重新在反共潮流中乘风破浪。右翼教父 笹川良一与児玉誉士夫，在东条及 6 位同僚被处绞刑的第二天获释，给人的印象是利用他们坐牢获得的名人资格，直接从监狱大门走进了出版社的大门。 笹川于 1949 年 5 月出版了回憶录《巢鸭の表情——战犯狱中秘话》。児玉誉士夫的回忆录《运命の门》，封面是巢鸭监狱的特写，则于 1950 年 10 月面世。⁷²

有一位日本战犯，前陆军大佐辻政信，甚至未经在巢鸭的停留过渡，就直接从恶名昭彰者变身为著名人士并且获得了商业的成功。辻政信是狂热的理论家与残暴病态的参谋官。他对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大屠杀事件（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皆负有重大责任，他还参与了几起残虐行为，甚至包括处死美国俘虏之后的噬食人肉的行径。辻政信名义上作为日本最声名狼藉的逃亡战犯，在 1950 年现身公众之前，实际上先是得到中国人后来又得到美国人的庇护。战败后，他逃脱了英军的逮捕并从东



1949年12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圣诞节中释放的战犯之家属，雪中守候在巢鸭监狱带刺的铁丝网外。

南亚潜入中国，由于丰富的军事谍报知识和激烈的反共思想，得到蒋介石手下国民党军的重用。1946年中期，辻政信假扮成中国的大学教授秘密回国，得到以前军中同仁的支持潜伏下来。对此威洛比（Willoughby）少将完全知情，而支持辻政信的军中同仁们，就是威洛比集合在麾下以资将来作为反共日本军的核心集团。1950年元旦，美国指名通缉辻政信为战犯，他的秘密逃亡生涯才告终结。同年，辻政信的潜伏生活结出了两本畅销书的硕果。一册讲述他的“地下逃亡生活”，另一册叙述瓜达

513 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1952年初，关于新加坡攻略的第三本书，从这位旧日杀人犯的手中问世。就在同一年，占领终结之后不久，辻政信当选为故乡石川县的众议院议员。⁷³

辻政信的书受追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大放异彩的军国主义者的邪恶魅力：他智斗胜者，像幽灵般地消失，从未蹲过一日牢狱。日本在屈从于美国人统治4年之后，仍然看不到占领终结的迹象。辻政信、笠川良一、児玉誉士夫与东条英机等反叛形象，难免会对即使不支持他们政见的国民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政治姿态已然成为笑柄。先前敌对的日本人与美国人，战争罪犯与他们的审判者，现在已经站到了同一阵

线。即便审阅制度的解除，使这些日本圣战的拥护者可以公开发言，他们的见解也只能是边缘化的声音。日本投降 4 周年时，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向报社致函，说他意识到，几乎没有人还在真正为战败悲伤。这不仅是人们在公开场合的真实表示，而且他耳闻亲友间私下的谈话也莫不如此。他认为战争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打碎个人的尊严。这反映出一般人的普遍意识。⁷⁴事实上，没有日本人仍然幻想过政信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旧梦，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没有人再想记住帝国“蝗军”在短命的征服圈中确曾做过的一切。

在这种存心遗忘的氛围中，此后的岁月目睹了公众意识中 A 级战犯与 B/C 级战犯大规模的名誉恢复。被认定有罪并判刑的被告，开始被公认为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他们在日本国内监狱的服刑，极尽愉快舒适之能事。那些多是在异国他乡被处以极刑的人，通过他们辞世的遗言而复苏。人们记住了罪犯，却忘记了他们的罪行。

巢鸭监狱服刑者的待遇，是早期最为明目张胆的例证。巢鸭监狱的在押犯总数约 4000 人，其中的数百名战犯被给予了诸多便利。起初他们就被允许发行自己的报纸《巢鸭新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获得了堪称第一流的现场娱乐。被称为“巢鸭礼堂”的小剧场为他们修葺一新。从 1950 年 11 月石井芭蕾舞团的演出开始，确实有一连串的明星登上过巢鸭的舞台。当从监狱外面来的艺人们排好队伍为这些有名的观众演出时，这些表演仿佛带有某种御前演出的气氛。

占领结束后的数年间，这些表演节目继续进行，既不保密也不偷偷摸摸。艺人们高兴地为拍照摆好姿势，最受欢迎的背景是巢鸭独具特色的高墙和瞭望塔。来访艺人的数量和节目的丰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统计，仅 1952 年全年至少就有 114 次演出，参演艺人近 2900 人。著名的喜剧俳优横山エンタツ与柳家金语楼都曾在巢鸭的礼堂演出。小提琴家诹访根自子也曾在此演奏，参加演出的还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一些流行歌手，包括童星美空云雀、以爵士乐闻名的笠置静子、灰田胜彦、赤坂小梅和藤山一郎。大名鼎鼎的日剧舞蹈团与鲜为人知的艺伎团体、各县的民谣舞蹈家等，都曾为在押战犯登台献艺。这里还上演过传统的剑道表演。从留下的照片资料判断，娱乐款待在押犯们的年轻女性，衣着暴露、造型奇异，远远超出了那些阴沉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当

初作为皇道道义的裁判者所允许在公众面前展示的尺度。还有些娱乐活动是在监狱外进行的。1952年3月28日，专业棒球队读卖巨人队与每日猎户星队，以一场表演赛为在押犯们欢庆占领即将结束。巢鸭运动场还曾因“日本女子野球リーグ”（日本女子棒球联盟）比赛和西式摔跤比赛而增辉。马术团队表演完毕，曾经像士兵一样在观众面前排齐队列合影留念。女子体操选手也在镜头中向巢鸭的观众微笑。⁷⁵

1952年夏，由于一首感伤歌曲的发表，服刑战犯的战争受害者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歌曲的词作者代田银太郎与曲作者伊东正康，因战争罪行在菲律宾被宣判死刑，但实际未被处死。代田宣称他是遭人构陷，并在菲律宾蒙特鲁帕（Monten Lupa）监狱的多位狱友被处以死刑之后，于1952年初写出了这首让人流泪的歌。歌曲的题目是《啊，蒙特鲁帕夜深沉》，这首歌完美展现了日本式的感伤，据说曲调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就连监狱的菲律宾看守也禁不住哼唱它。

这首歌曲于4月29日（日本恢复独立翌日）在蒙特鲁帕监狱首次推出，当时还齐唱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并集体向遥远的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这是皇军在亚洲大陆横冲直撞之时，向天皇日常敬礼的仪式。通过狱中的日本忏悔牧师，代田与伊东成功地让著名歌手渡边浜子将这首歌介绍到了日本，并在那里轰动一时。

歌曲展现了夜深人静之时，囚人对“遥远故乡”的“难耐的思念”之情。举头望月，泪眼蒙眬，梦中见到了“慈母”的身影，看到她悲叹“爱儿何时回还”；想象母亲的心“一直向着南方的天空飞来”，像“呼子鸟”（即杜鹃鸟，子规）寻子般哀鸣。歌曲的最后一段唱到，当清晨终于来到蒙特鲁帕，囚人的心中也升起太阳，给他们以希望和勇气“坚强地活下去……直到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对于“初升的太阳”所寄托的民族主义和乡愁，再也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表现了。此后不久，蒙特鲁帕的战犯死囚们绝望的心愿成为了现实。1953年7月，他们全体被遣返日本，一部分恢复了自由之身，其他人则被移送巢鸭监狱。当他们的遣返船到港时，大约有28000人迎接他们回国，却无一人提及天皇的陆海军士兵在菲律宾杀害的母亲、孩子和俘虏。⁷⁶

当生还的战犯受纵容之时，缅怀荣耀已经处死的战犯并恢复他们因

统一的“战犯”标签而失去的个性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经过效果出色的保守派的出版活动，这些死刑犯的遗嘱、最后的家书、辞世诗和临终遗言被辑录发表。1950年到1954年间，编辑出版此类书籍15本以上。日本人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为这些死刑犯盖棺定论，让他们仿佛由墓中走出，自己开口说话。⁷⁷

这些出版物中内容包罗最广泛、最广为人知的，是1953年12月出516版的大部头文集《世纪の遺書》（三栏式，741页）。文集收录了因战争罪被处以死刑的692人的译作，他们个性与见解的丰富多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文字正如学生兵的书简、永井隆对长崎的思考，乃至太宰治的杰作《斜阳》一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为它们反映了面临死亡之人的思想与情感。⁷⁸

有名的或曰恶名昭著的人，在此对自身所受的审判进行了评价。在这些遗书中，东条英机的遗言占有永久性的地位。东条为战败向国民与天皇道歉，同时断言自己并无国际上的犯罪行为。他申述，东京审判是政治审判，而且美国人和英国人犯了三大错误。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垒；容许了满洲（东条旧日的关东军根据地）的赤化；并将朝鲜一分为二，为将来的纠纷种下祸根（这是东条英机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半之前的预言）。像竹山道雄的小说《缅甸的竖琴》中的僧人一样，东条认为，要永久根绝战争，必须排除人的贪婪和欲望。然而，与那位乐观的托钵僧不同，东条相信，人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并由此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要求美国人不要让日本赤化。在遗言的结尾，东条为军部可能犯下的“错误”谢罪，但同时要求美国对使用原子弹与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⁷⁹

对巴丹死亡行军负有“命令责任”而被问罪的本间雅晴陆军中将，在最后的家书中，对胜者的审判有类似的评价。他断言，“说美国是公正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提到数十万被空袭与原子弹夺去生命的日本人，他忧郁地评论，“宇宙上国际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正义”。⁸⁰一些死刑犯承认了对其罪行的指控，但更多的死刑犯的反应是，对他们的审判基本上是双重标准和报复行为，根本没有确保真正公平的审理。包括本间雅晴在内的几位死刑犯，还引用明治维新时代的谚语讽刺说，“胜则官军，负则贼军”。⁸¹

这些死刑犯的临终遗言，几乎无一例外都透露出对身后家人的深切关注，以及迫切希望消除所爱的人和社会全体心目中真正将他们视为“罪犯”、而不只是战败悲剧的牺牲者的印象。不能对临终“私人”书简中的这些想法评价过于认真。为人子者得劝慰双亲，为人夫者要安慰妻子，为人父者得抚慰儿女：他们不是凶手和畜生；对他们已经被证实的任何罪行，他们都有解释的理由；他们所爱的人仍然可以昂首做人。大部分书简都是私下的通信，不必保证所说的话都真实可信，并不像编纂者们想让读者们相信的那样。不过安慰的假话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通常难以说清，有时无疑对书写者本人来说也是如此。

日本文化中最为珍视的家族关系的纽带，最使人落泪、最感伤的当然是母子间的亲情。多愁善感的歌曲《啊，蒙特鲁帕夜深沉》之大受欢迎即为明证。《世纪遗书》中相当数量的信简，同样流露出这些死刑犯对母亲深深的依恋。其中数封信都引用了吉田松阴著名的绝命诗。吉田松阴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天皇之名集结颠覆幕府封建体制的魅力非凡的年轻武士。1852年，年仅29岁的吉田松阴因计划暗杀幕府阁老而被处以死刑。在斩首当日，吉田写下了以下诗行：

母亲的思念
甚至远胜过我们
对她的思念
我不知母亲今日
闻此消息又如何³²

此后不久，“叛逆者”与“罪人”吉田松阴被神化为近代日本的英雄，成为目的纯粹与悲剧性牺牲的完美象征。近一个世纪之后，对这些将要作为明显的失败者甚至是恶人死去的囚犯而言，吉田身后的清名，成了他们希望与慰藉的源泉。同时，吉田对西洋“夷狄”的帝国主义侵略直言不讳的批判，并不会减损他的魅力。然而，吉田的绝命诗为人珍爱的原因，主要还在于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流露出对母亲最后的思念和牵挂。他由此成为了有情有义的好男儿。

在较低级别的审判中被判死刑者的书信，时常提到的是“牺牲”二

字。这样的人，可能是将自己视为“国家的尊贵的牺牲”或者国家“以 518 血付出”的牺牲，或是“战败的牺牲者”，“日本再建”、“民族的”的牺牲者，乃至更加充满希望的“世界和平”的牺牲者。⁸³对于牺牲的原因，他们之间并没有一致性的认定。对有些人来说事情简单明了，就是因为同盟国。在新加坡被判死刑的一位军官，将自身简单概括为“英军复仇的牺牲品”。⁸⁴然而，还有许多人将自己描绘为上级的牺牲品，是上级命令他们执行了现在被认定有罪的行动，然后又以同样不负责任的逻辑予以否认。⁸⁵其他人则将自己视为战争本身随意的牺牲者。1946 年在缅甸被执行死刑的一位日本宪兵队军官，在遗言中对义务与个人责任进行了哲学性的思考，并得出结论，像他们这样的人只是“战争带来的暧昧的牺牲品”。⁸⁶

像其他多数由这样的文章汇编成的文集一样，《世纪の遗书》中所附的意义难明的作者简历，反映出用心颇深的保守性。简历中只提到了作者在哪里被执行死刑，却并未提及处决的缘由。其实，许多人的遗书中都谈到了他们被控告的罪行，有的还颇为详细。然而，这些出版物的意图，基本上是为这些显然不名誉的死者赋予人性的色彩，并赦免他们（至少是赦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战争罪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这种宽恕成了天皇所受美国人的包庇自然的、镜像般的映照。正如裕仁被赦免所做的恶事或曰战争责任一样，现在无论被诉战犯曾在战争的大熔炉里做过什么，他们也得到了暗中宽宥——当然是被那些没有受过他们行为伤害的人。战犯们柔情的话语被引述，然而他们真实的所为却被忽略。他们被描绘成对参与事件完全无力左右的人。天皇著名的《人间宣言》是一种降格，从“现人神”降到了人间。与此相反，这些战犯也从魔域被引领提升到了同一个人间。但是无论是活着的神还是已经处死的战犯被赋予了人性，最终给人的印象都是昔日日本帝国的上上下下，无人真正为恐怖的战争以及随之遍布各地的暴行负责。

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改写、对全体帝国陆海军的人性面目的恢复，是修复国民心理的环节。假使这些最可耻的军人无论缺陷多么严重，都能被展现为复杂而敏感的人，那么即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能弱化掠夺成性的“蝗军”的恶名。因而这种出版物的反动力量不可小视，因为这些遗嘱容易被解读为日本的牺牲者文学的另一亚种。他们还可能被看作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白人的文本。因为尽管这些死刑犯在召集战犯审判的每个战区都主张自己无罪，但是他们辛辣地表现了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严酷与双重标准。⁸⁷ 仅在个别情形下，这些遗书才使人想到日本人曾经多么严重而且无谓地牺牲了亚洲其他人民。

尽管如此，《世纪の遺書》这样的遗文集给人的总体印象，既不是愤怒甚至也不是辩解，而是压倒一切的徒劳感、悔意和悲伤。战犯们的遗言，与自由主义和左翼学者汇辑出版的战殁学生兵的遗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事实上，《听，海神之声》中最动人的遗书，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部学生木村久夫所写。木村久夫于1946年5月在新加坡因虐待俘虏罪被作为战犯处决。1948年木村久夫的评传出版，他不寻常的遗言，就潦草地写在田边元的哲学书的书页空白处，与他狱中的诗作一道收入《听，海神之声》。《世纪の遺書》在木村久夫的条目之下，除了同样的诗作之外，还收录了他给父亲最后的书简。⁸⁸ 木村写于绞刑前一日的两首绝命诗，其中一首传达出26岁的他直面死亡时的了然心境：

风止雨停歇
朝阳何清新
明日我将去

另一首可能会让日本读者联想到吉田松阴：

既不害怕也不悲伤
我将走向绞首架
心中珍藏母亲的笑脸

520 除了少数的例外，被处决战犯写下遗书并非是为了日后的出版。这些遗书是向当事人的遗属和友人广泛呼吁后搜集出版的。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矛盾的两面性：它们一方面削弱了战争责任的意识，另一方面却强化了人们为军国主义和战争所付出的可怕代价的记忆。像战殁学生兵的书信与“原爆”牺牲者的回忆录一样，这些遗书成了人生被战争

所毁的日本人的个人肖像集之一。他们通常是美化了的自画像，以一种奇特的、至少是未曾预料的方式，协助奏响了数年前大佛次郎提到的日本战死者的“安魂曲”。这些遗书的语言像是哀怨的挽歌。这些作者可能是因为“常规的”战争犯罪而被处决，但其中许多人的文笔却很不寻常。此外，出版时的版式与体裁也突出了哀歌体的风格。

例如，《世纪の遗书》的序文中，加进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铜像照片。依照同盟国战犯审判的开庭地点对遗书进行分类，每一部分从所收遗书中选取动人的词汇作为小标题。在中国接受死刑判决者的遗书条目，其小标题为《日支之楔》；在缅甸接受英国人审判者，其遗书分类标题为《命运》；香港的则是《迎春》。巢鸭监狱收押的死刑犯的遗书，标题为《紫罗兰》；关岛死刑犯的遗书，标题就叫《人间》。

每个人的作品，也由编者从遗书文本中撷取只言片语作为标题，这些题目也充满悲伤、沉思和人性的基调，传达着此书出版者的意图。如在中国受审者的题目有：《来自黑暗的世界》、《中国兵之泪》、《深爱的日本》、《虚无与忘却》、《日日是好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受审者的题目有：《生命的余白》、《彼岸的友情》、《百人之颜》。澳大利亚的则是《善与恶》。马来亚与北婆罗洲的有《告英国》、《回到母亲身旁》（作者的母亲去世了）。缅甸的有《はる子さんへ》（《给晴子（或春子）》），这是一封写给幼小女儿的信，没有文字，完全以表示语音的假名写成。印度支那的是《不同的人们》。关岛的是《科学者的思虑》。巢鸭监狱则有《独来又独去》、《背负十字架》（作者在狱中学习了基督教的赞美诗）、《哭墙》、《白云》、《永远的和平》、《别》。⁸⁹ 对敌人而言他们是残暴邪恶的罪犯，对许多国人而言，他们现在成了哲学家和诗人。

《世纪の遗书》在一本月刊上摘录发表，其简短的序言提到，这些遗书是能鼓舞整个日本民族并帮助全人类净化的“伟大的圣书”。编辑呼吁读者振作起来，记住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发表遗书的杂志名《曙》，本身就是“黎明”的意思），并献身于确立永久之和平。⁹⁰ 这是战争年代经常听到的有关纯洁与和平的说教。这是宽恕不名誉的死者的民族主义的辩解。这是遮蔽日本的战争罪犯与暴行的可怕现实的烟幕。但这也是在这个极端内向性的世界里的反战声明。被判死刑的战犯的许多书信，以深深打动读者的方式，强化了这一宣言。一位军医写给年幼的女儿最

后的一封家书，颇具代表性。他告诉女儿，在一生中尽量不要杀害任何生命，即便是一只蜻蜓。

这名军医因虐待同盟国俘虏的罪行，被处以死刑。⁹¹

注释：

- 1 《朝日新闻》1945年8月16日。高村光太郎的诗作题目为《一亿の号泣》，参见《朝日新闻》8月15、17日。
- 2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1日。此文及其后还有三篇文章，皆以《英灵に詫びる》为题：一位朝日新闻记者对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回忆（8月22日）；畅销历史小说家吉川英治的访谈（8月23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的一位教师狂乱的情感宣泄（8月24日）。
- 3 与德国的犹太人不同，日本的受害对象，即便与日本人产生了切身的关联，如朝鲜和中国的劳工或者“慰安妇”，也从未被认为是日本社会的一员。除了少有的例外，“泛亚”的说辞纯粹是宣传而已。
- 4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东京：岩波书店，1973），第6卷，pp. 46–57，尤其可参见p. 55。此文原载1945年9月1日《帝国大学新闻》，开篇也是首先表达对天皇终结战争的感谢。关于南原热心支持战争的言论，参见他1945年4月1日对入学新生的演讲，《南原著作集》第6卷，pp. 38–45。
- 5 《南原繁著作集》，第6卷，pp. 57–66。
- 6 收入文艺春秋编，《〈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东京：文艺春秋，1988），第2卷，pp. 15–18。战后初期，对死者的哀悼多关注于战死的年轻人，但是这种情绪也投射到了空袭遇难的一般市民身上。1945年9月23日，在东京空袭遇难者的追悼仪式上，亡者被告知“你们是为国家失去生命，我们永志不忘”。这些牺牲，誓将成为“和平日本建设的基础”；《朝日新闻》，1945年9月24日。
- 7 《家の光》1946年6月号；引自吉田裕《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一桥论丛》105卷2号（1991年2月），p. 123。吉田裕的论文（pp. 121–138），充分利用了当时呈交GHQ审阅的大量日文报刊资料，这些资料现存于美国马里兰大学McKeldin图书馆。从本文以下的注释可以看出，笔者十分倚重吉田教授发掘的史料。本人也借重于吉见义明基于这些文献所做的同样颇有价值的研究，参见吉见义明《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战争责任をあぐって》，《思想》811号（1992年1月），pp. 73–99。
- 8 菊池宽《话の屑笼》，《キング》22卷1号（1946年1月）；引自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23。
- 9 森正藏《旋风二十年——解禁昭和内幕史》（东京：鳞书房，1945，1946），全二卷。森是实际上写作这本书的每日新闻团队的统筹编辑。对这本著名畅销书的最佳评析，是尾崎秀树的《旋风二十年》，收入朝日ジャーナル编，《ベストセラ一物语》（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第1卷，pp. 7–15。亦参见盐泽实信《昭和ベストセラ一世相史》（东京：第三文明社，1988），pp. 100–102。1946年的版本有多处修订，可能是遭受GHQ审查的缘故；前引尾崎之论析，p. 14。

- 10 森《旋风二十年》，上卷，p. 42；典型的有关败战责任的成见的其他例证，亦可参见森前引书下卷 pp. 88, 121, 151–152, 189。
- 11 森《旋风二十年》，上卷，p. 142；亦参见森前引书上卷，pp. 18, 120, 136–137, 167；下卷，pp. 32–33, 58, 62。一度实业家与军阀暧昧勾结，为非作恶，同书下卷，p. 129。
- 12 《朝日新闻》1945年9月12、13、15日；朝日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1984），第1卷，pp. 35–36（对《战阵训》的典型援引）；保阪正康《败战前后的日本人》（东京：朝日文库，1989），pp. 246–250（高见顺的记述与东条的病房会见）；渡边一夫《败战日记》（东京：博文馆新馆，1995），p. 85。东条的自杀事件是根据 B. V. A. Röling 的记述，引自 Antonio Cassese 编，《The Tokyo Trial and Beyond: Reflections of a Peacemaker》（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p. 34。东条被作为首犯的例证，参见森《旋风二十年》，上卷，p. 102；下卷，pp. 88, 114, 121。据1945年末在东芝工厂的调查，80%的白领和蓝领雇员表示对东条抱有敌意；参见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90（其他批评观点，参见 pp. 78–79, 81, 82）。多年后，东条之妻回忆起她的家族当时遭受的屈辱。她和孩子们逃到了她的家乡，但仍然收到许多来信。有的信是表示同情，但是很多信都充满了仇恨。她回忆说，有位写信者扬言要给她和每个孩子都寄来棺材。她的一位女婿也是军官，自杀了。她的长子从公司辞了职。两个最小的女儿改换了姓氏，以免在学校引起注意和嘲笑。参见东条胜子，《战後の道は远かった》，《文艺春秋》1964年6月；收入《〈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下卷，pp. 99–111。
- 13 森《旋风二十年》，上卷，pp. 149, 161。
- 14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3、25日。从8月8日到9月2日，涉及原子弹爆炸的新闻报道，仅在《朝日新闻》上出现过5天（8月10、24、26、28日，9月2日）。从9月3日到16日审阅制度开始生效的14天里，涉及原子弹爆炸的报道，一共出现在9期日报上（除了9月4、9、10、13、15日）。
- 15 《朝日新闻》1945年8月14日。清瀬一郎敏感于人种问题的另一例证，参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32。
- 16 日本人描述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标准形容词，是“残暴”、“非人道”。笔者曾在他著述中探讨过日本人对原子弹的反应，参见：Michihiko Hachiya, *Hiroshima Diary: The Journal of a Japanese Physician, August 6-September 30, 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一书中，本人所作的序言，pp. v–xvii; “The Bombed: Hiroshimas and Nagasakis in Japanese Memory”，收入 Michael J. Hogan 编，《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116–142；“Three Narratives of Our Humanity”，收入 Edward T. Linenthal 与 Tom Engelhardt 编，《History Wars: The ‘Enola Gay’ and Other Battles for the American Past》（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6），pp. 63–96。
- 17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7日。亦可参照《朝日新闻》1945年8月18、9月12、16日。
- 18 《朝日新闻》1945年8月17、18、19、20、22日；可参照《朝日新闻》1945年8月26、28日。

- 19 《朝日新闻》1945年9月5、10、21日；10月23日。
- 20 《朝日新闻》1945年10月11日。战败后的数周，有关科学与“理性”的其他的新闻评论，参见《朝日新闻》1945年9月12、14、15日，10月1、2、18、26、29日。
- 21 《朝日新闻》1945年9月14日。
- 22 那份曾贴在东京帝国大学相模海洋研究所的通知原件，现展示于 Woods Hole (Massachusetts)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的图书馆中。通知为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团胜磨所写。感谢 Tom Benjamin 向我推荐了这一文献。
- 23 有关记者招待会，参见1945年8月30日《每日新闻》，收入日高六郎编《战后思想の出发》(东京：筑摩书房，1968)，pp. 53–58。著名的“一亿总忏悔”的说法，其实并未出现在《朝日新闻》的首相记者招待会记录中（会议记录的说法是“全体国民的总忏悔”），而是出现在当日报纸的社论中。还可参见9月5日东久迩首相的施政演说，载9月6日《朝日新闻》。
- 24 丸山真男《思想の言葉》，《思想》381号(1956年3月)，p. 322。
- 25 《朝日新闻》1945年10月19日；这些信件见载于朝日新闻社在日本投降后两月内收到的读者来信的摘录中。亦可参见9月27日《朝日新闻》刊登的读者来信，收入朝日新闻社编《声》，第1卷，pp. 39–40。
- 26 引自 James W. Heisig，“‘The Self that Is Not a Self’：Tanabe’s Dialectics of Self-Awareness”，收入 Taitetsu Unno 与 James W. Heisig 编，《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anabe Hajime》(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0), p. 284。此书是关于田边元哲学思想的重要的英文论文集。对田边元颇有兴味的分析，见久山康《战后日本精神史》(东京：创文社，1961)，pp. 170–201；此分析曾摘引于“Postwar Japanese Thought: 1940–1960”，*Japan Christian Quarterly* 47.3 (Summer 1981): pp. 132–144。1930年代后期，田边元竟然将日本国家表述为真的佛性的显现，是大慈大悲的菩萨理想的化身，个人对国家的顺从实质上就是对佛的皈依。这是佛教的流俗化与哲学的堕落，是后来田边的耻辱感与罪孽感的真正缘由；参见 Kiyo-shi Himi, “Tanabe’s Theory of the State”，收入 Unno 与 Heisig 前引书，pp. 309–310。1943年，也就是田边思想转变的前一年，他还写道，“危难时国家与个人是一体的；民众须竭力奉仕国家。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同时也意味着毁灭个人本身”；引自 Heisig 前引书，p. 283；可对比同书之 pp. 281–284。甚至1946年在其卢梭式的忏悔论述中，田边也未真正涉及他对战争遂行重要的理论贡献。例如，1934年他曾提出了影响极大的“种の论理”的概念，完全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推行由神圣天皇统治的单一种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参见前引之 Himi, pp. 303–315。1940年，田边元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杰出前辈西田几多郎，曾私下坦率评论说，田边的著述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这是中肯的评价。田边本人哪怕是在最为自我否定的时刻，也未能对此进行忏悔；西田的评论，见 Heisig 前引书，p. 283。在1945–1946年忏悔与转变的著述中，田边仍然对他的“种の论理”的洞见进行了再次的确认。田边元的战后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脱胎于他的战前思想、可以如何被独裁统治所利用，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 27 田边元《忏悔道としての哲学》，(东京：岩波书店，1946)。此书由 Yoshimori Takeuchi 译为英文，James Heisig 作序，《Philosophy as Metanoetics》(Berkeley: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此译本下引为 *PM*。

28 *PM*, pp. xlix – lx, 3, 26.

29 *PM*, p. lx; 亦参见 p. xxxvii。

30 *PM*, pp. lvii – lviii, 20, 265, 270; 亦参见 pp. 281, 295。田边元的著述，力图阐明他基于亲鸾的思想，与诸如康德、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克尔恺郭尔等西方哲学相比之优越性。战败后日本知识阶层这种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尝试，值得进一步研究。1945年8月20日，田边“京都学派”的同僚高坂正显，在《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赞扬西方的“客观性”与“现实”，批判日本的“主观性”，但仍坚持认为日本具有对世界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力。高坂抨击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间的文化鸿沟；颂扬日本人对家国的道义，但认为日本“社会道义”缺失，而“社会道义”本质上是调停国与家关系的中间力量；他提到贯穿日本历史的特殊的“神圣力量”；具有象征意味地总结说，新日本将会反映日本之传统的再生与变容。此文收入日高六郎编《战后思想の出发》，pp. 60 – 63。

31 *PM*, p. lvii, lxi – lxii, 281。花的比喻，引自 *Japan Christian Quarterly*, 见前引书, pp. 137, 142。

32 *PM*, pp. 261, 278 – 279.

33 例如，参见 *PM*, pp. lxii, 263 – 265, 291。1946年3月，田边在一篇题为《政治哲学の急务》的重要文章中，对“社会民主主义”做了论述。时值《忏悔道としての哲学》出版前一个月。

34 *PM*, p. 296。在此书的序言中，田边元对占领军“自上面下的革命”做了精辟的批判：“然而一个被迫投降、受到外来的自由主义所迫使以及内在的文化发展所催促的国家，只是因为排除了以往的压制就能被指望拿出创造新文化的精神资源吗？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赠与的，而是自己争取得来的。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即便新文化之花能够开放，那也只是温室的花朵，看上去很美但是根基浅弱，不可能在户外生长”；*PM*, p. lxi。令人震惊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段落，竟然通过了 GHQ 审阅官的审查。也许是因为这些论述，隐藏在如此长篇大论的一部书中，才未引起注意。

35 田边元在1946年3月的《政治哲学の急务》一文中，号召划分皇室财产。此时恰为 SCAP 巩固其天皇保卫哉之际。

36 *PM*, pp. 287, 296; 亦参见 pp. lxi – lxii, 260 – 262。田边元在《忏悔道としての哲学》出版后数年间著述颇丰。1947年 – 1950年，田边除了发表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四部著作：《种の论理の弁证法》（秋田屋，1947）；通过存在主义的分析对忏悔与爱的探讨《实存と爱と实践》（筑摩书房，1947）；对福音书中基督教之爱的研究《キリストの弁证》（筑摩书房，1948）；以及广受欢迎的《哲学入门》（筑摩书房，1949）。

37 日本战歿学生手记编集委员会编，《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日本战歿学生の手记》（东京：东大协同组合出版部，1949）；尤可参见 pp. 307 – 323 的附言。对这部学生书信集肯定的反应的例子，参见朝日新闻社编《天声人语》（东京：朝日文库，1981），第1卷，pp. 261 – 262（1949年10月24日）；亦参见《声》，第2卷，p. 216（1949年11月4日）。《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很快卖出近20万部，成为1950年的畅销书，并在此后的岁月中畅销不衰。到1992年，此书共售出约180万

部；《朝日新闻》1992年8月15日。

38 意即“未被肮脏丑恶沾染”的人。

39 竹山道雄《ビルマの竖琴》（东京：中央公论社ともだち文库版，1948），pp. 270–275。此儿童读物版，在其后的两年间重印了6版。这部小说由Howard Hibbett译为*Harp of Burma*（Rutland, Vt. : Tuttle, 1996）。

40 《はるかなる山河に》于1951年12月再版，新版附记生动地传达出幸存者对死者的罪的意识。在初版前言中，法国文学研究者辰野隆也曾深情吐露，许多年轻的学生死去而自己却残存下来的耻辱与痛苦。他认为战败是对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后因暂时胜利而狂妄自大的神圣惩罚，并认定惩罚日本的手段是“对方的物力与科学”。参见《はるかなる山河に 东大战歿学生の手记》（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1年版）。

41 椎名麟三的评论，见久山《战后日本精神史》，p. 96。

42 《野火》与《缅甸的竖琴》在1950年代末期被搬上银幕。表现无辜的日本平民遭受战争戕害的最著名的电影，是占领结束后两年上映的《二十四の瞳》。影片描述了战前偏僻的乡村中，一位理想主义的、年轻的小学女教师与12个学生的命运（这就是片名的由来）。正如影评家佐藤忠男所敏锐指出的，影片感人的魅力主要源自它一分为二的结构：起初观众见到的是年轻的女教师和她可爱的学生们；然后又看到上了年纪的她，在战后回到自己曾经短暂待过一年的村子，给以前的几位学生扫墓。从而影片传达出的印象是，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永远拥有他们孩童时代的纯真。观众们并未见证这些少年如何成长、如何参与海外的侵略和杀戮。如此一来，孩童的纯真，就成为了表达战死者纯洁性的手段。佐藤的文章收入鹤见俊辅等编《讲座日本映画 第五卷 战后映画の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87），pp. 46–47。

43 例如，可参见“和平问题谈话会”早期颇有影响的声明，收入《世界》1985年7月关于战后和平问题的特别号。

44 对战争责任的旁观者态度，是个人责任的“主体”意识薄弱的表现。这一观点，是战后日本的研究者在强调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时的共同见解。这在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尤可参见 pp. 122–123, 135, 137）与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尤可参见 pp. 76–78 关于民众意识“被欺骗”的论述）等重要论文中，皆有强力阐述。

45 《晓钟》1946年6、7月合并号；引自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p. 129–130。

46 《家の光》1949年1月号；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35。

47 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p. 129–131, 137–138。

48 见前引之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77。

49 收录于朝日新闻社编《声》，第2卷，p. 100（1948年11月13日）以及 p. 113–114（1948年12月24日）。

50 《天声人语》，第1卷，p. 97（1946年7月27日）。

51 当论及战争责任问题时，朝鲜人与台湾人所受的战争苦难相对被较少提及，参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34。日本人对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的震惊反映，与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军队吃人等行为有关，参见《声》第2卷，

pp. 107 – 108 (1948 年 12 月 6 日)。一般而言，除了最初揭露 1945 年马尼拉大屠杀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似乎并未有意关注东南亚的受害民众。此种倾向，即便是在战后进步的研究者和活动家深入调查日军战争暴行时仍然存在。他们的著述，首先倾向于关注中国受害者，其次是朝鲜受害者。尽管这两个亚洲民族受日本伤害最大，但是这种倾向不是仅以数量问题就能解释的，还与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心理的距离感有关。

52 参见《朝日新闻》1945 年 9 月 16、17、18 日的新闻报道；1945 年 10 月 19 日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及《声》第 1 卷，pp. 103 – 104 (1945 年 12 月 13 日)，p. 152 (1946 年 2 月 15 日)。

53 《朝日新闻》1945 年 9 月 18 日。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令人困惑之一例，就是为何揭露非日裔随军慰安妇这样厚颜无耻的“隐蔽的战争犯罪”，费时如此之久。具体而言，比如说为何日本女性这么久才注意到这一问题？对这一点的解释，至少应当考虑种族和阶级的因素。充当随军看护妇的日本女性对外国慰安妇的存在心知肚明，她们通常像日本男性一样，歧视慰安妇，将她们当作外国妓女来看待。

54 《太平》1946 年 11 月号；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26。

55 例如，参见《朝日新闻》1945 年 9 月 17 日；《天声人语》，第 1 卷，p. 95 (1946 年 7 月 8 日)，p. 97 (1946 年 7 月 27 日)。

56 《アジアの新生》，《言论》第 1 卷 1 号 (1946 年)；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26。

57 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76。这种文字游戏，实际上在战时中国人（以及协助中方制作抗日传单的美方心理战专家）的反日宣传中也得到了应用。

58 《天皇の军队》，《人民评论》第 2 卷 3 号 (1946 年)；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26。

59 例如，参见《声》第 1 卷，pp. 144 – 146 (1946 年 2 月 2 日)，pp. 211 – 212 (1946 年 8 月 8 日)。

60 4 首短歌皆收入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p. 82, 86。

61 《每日新闻》1948 年 11 月 5 日。《VAN》(1947 年 12 月号) 与《世界》(1949 年 2 月号) 的评论报道，参见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35。

62 《每日新闻》1948 年 11 月 13 日；《日本经济新闻》1948 年 11 月 13 日；《朝日新闻》1948 年 11 月 5 日、13 日；《日经连タイムス》1948 年 12 月 25 日，引用于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p. 124 (吉田批评这种反应，典型是在逃避正视国民对战争协力的问题)。关于东京审判的新闻评论被审查的实例，参见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p. 83 – 84。

63 《每日新闻》1948 年 11 月 13 日。

64 《静冈展望》1949 年 2 月号；引用于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82。

65 村田芳留子《水瓮》，1949 年 3 月；收入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p. 83 – 84。

66 收录于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84。

67 《青垣》1949 年 5 月号。收入吉见《占领期日本の民众意识》，p. 84。对东条被判死刑的矛盾反应的例子，参见鹤见俊辅等编，《日本の百年》(东京：筑摩书房，

- 1967), 第 1 卷, pp. 54 – 55, 61 – 62。
- 68 Röling 法官等人就认为,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的证词, 顽强主张战争是维护日本本国生死攸关之利益, “在日本人眼中获得了自身的尊严”; Röling (1993), p. 34。
- 69 吉田《占领期における战争责任论》, p. 134。在 1948 年的一场讨论会中, 戒能通孝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即“东条审判”这样的战争审判是否有误? 同样遭到了查禁。
- 70 《天声人语》第 1 卷, pp. 256 – 257 (1949 年 9 月 16 日)。使许多日本人震惊的是, 威洛比少将公开表示, 这些报道可能有一定的真实性。
- 71 艾尔克伯格中将臭名昭著的评论, 参见 Kazuo Kawai, *Pacific Affairs*, June 1950, p. 119。
- 72 例如, 参见《历史读本 别册 未公开写真に見る东京审判》1989 年冬号, pp. 158, 159。堀玉善士夫的回忆录, 后来有英译本。
- 73 对辻政信生平的细致研究, 参见 Ian Ward, *The Killer They Called a God*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1992), 尤可参见第 18 – 20 章有关辻政信败战后的活动。关于 1946 – 1950 年间 Willoughby 将军对辻政信的庇护问题, 在新闻界未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有所提及, 参见 Keyes Beech 的评注, Thomas W. Burkman 编,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Art and Culture* (Norfolk, Va.: 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 1984), p. 43。非常感谢 James Zobel 提示我关注这些文献。1950 年辻政信的两本畅销书是《潜行三千里》(每日新闻社)与《一五一十》(酷灯社)。
- 74 朝日新闻社编《声》, 第 2 卷, pp. 200 – 201 (1949 年 8 月 15 日)。
- 75 这些活动被摄影镜头巧妙地记录了下来, 参见前引之《历史读本 别册》, pp. 24 – 38。
- 76 《历史读本 别册》, pp. 68 – 73, 87 – 101。杜鹃鸟, 日语称为“呼子鸟”。日文中的一些幽微的含义, 自然会使听到这首歌的所有日本人浮想联翩。
- 77 参见《思想》1984 年 5 月号上刊载的有关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的参考书目, 其中既有学术著述也有畅销书, 颇值玩味。在“战争罪犯的遗著与遗嘱”条目下, 列有 1950 – 1954 年出版的书 16 本, 1982 年则是 31 本。到 1954 年, 至少出版了 9 本集鸭战犯与嫌疑犯的自述, 一本关于美国主持的横滨 B/C 级战犯审判的书, 有 6 本书则是关于亚洲各地的 B/C 级战犯审判。1956 年 – 1983 年, 又有 29 本关于亚洲各地 B/C 级战犯审判的书出版。A. Frank Reel 的著作 *The Case of General Yamashita* 是对那次审判不公的强烈质疑, 日译本出版于 1952 年, 同年 Pal 法官的个别意见书翻译出版。
- 78 巢鸭遗书编纂会编《世纪の遗书》(东京: 巢鸭遗书编纂刊行事务所, 1953)。1984 年讲谈社发行的新版, 应作者遗属的要求, 删去遗书 39 篇; 修订版的页码保持不变。
- 79 《世纪の遗书》, pp. 683 – 685。
- 80 《世纪の遗书》, pp. 579 – 583。
- 81 《世纪の遗书》, pp. 77 – 78, 101 – 102, 447 – 451, 579 – 583。
- 82 见《世纪の遗书》, pp. 66, 322, 483, 568, 630 – 633。
- 83 例如, 参见《世纪の遗书》, pp. 38 – 39, 63 – 64, 88, 90 – 91, 407, 468, 520, 637。

- 84 《世纪の遺書》, p. 311。
- 85 在后来出版的坂邦康编《史实记录战争裁判 横滨法庭 第一 B/C 级》(东潮社, 1967)一书中提及, 强迫下属为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官方政策(如帝国海军杀死敌船全体船员的政策)的暴行负责任的策略, 其实是掩饰官方政策, 找借口替天皇开脱。参见 pp. 102 – 104。
- 86 《世纪の遺書》, pp. 285 – 290, 尤其是 p. 286。
- 87 例如, 对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残酷与复仇的无情评价, 参见《世纪の遺書》pp. 113 – 118, 168 – 171, 183 – 186, 311 – 315, 332 – 333, 453 – 461, 483 – 487。许多战犯称扬在中国国民党监狱中得到善待, 哪怕是在感到对自己审判不公之时。蒋介石温和对待日本战犯自有其政治的计算(从而在反共行动中得到日本的支持), 结果使日本人在战后对“中国人”普遍怀有友善之情。例如, 可参见《世纪の遺書》pp. 8 – 9, 108 – 109; 《天声人语》第1卷, pp. 33 – 34 (1945年11月10日)。本书其他章节也曾述及, 中国共产党迟至1950年代初期对许多日本人进行了战犯改造, 但未施加任何死刑判决。
- 88 木村久夫的传记, 参见塙尻公明《ある遺書について》(东京: 新潮社, 1948; 社会思想研究会重印, 1951)。亦参见前引之《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pp. 281 – 304; 《世纪の遺書》, p. 433。木村遗书简略的英译本, 见 Michiko Aoki 与 Margaret Dardess 编, *As the Japanese See It: Past and Presen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pp. 297 – 303。
- 89 文中提到的这些遗书, 皆收入《曙》1954年1月特别号, 这一期杂志为《世纪の遺書》的精选集。
- 90 《曙》1954年1月特别号, p. 8。
- 91 《世纪の遺書》, pp. 407 – 408。这位军医的遗书, 是一份典型的主张自己无罪的遗书。他在战俘营担任军医,声称自己在决定谁应当上工劳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对战俘和日本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虚弱)一视同仁。(1984年版的《世纪の遺書》, 应作者遗属的要求, 此遗书也在删除之列)。

一般而言, 在战后关于战争与“战争牺牲者”的思考方面, 不能过分强调《世纪の遺書》所唤起的情感的影响。它们体现了对战争理想化的、保守的重构, 显然对右翼的新民族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同时, 它们还使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感到宽慰, 他们的亲友参与了战争, 不能只是作为“战争罪犯”、为“侵略战争”送命的人而被记住。因此, 当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 日本最大的民众团体之一“遗族会”, 主张向死于二战的日本人表明敬意, 并且反对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无条件地”、“明确地”谢罪。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自认为和平主义者, 许多人更自认为反军国主义者。他们对战死者的纪念活动, 必然包括和平的祈愿, 祈祷将来不会再有如此的日本人的“牺牲”。寡廉鲜耻的右翼政客照例对此进行操纵利用, 而日本以外的民众也照例进行声讨。